

## 彭真在「文革」前中共對外關係中的 角色和活動（1949~1966）\*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 摘 要

關於彭真對中共早期對外關係與工作的參與程度和活動情況，現有的中、西文獻皆對之注意不夠、甚至是低估忽視。彭真在「文革」前經常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高層會議（尤其是政治局常委會），直接與聞重大對外決策的形成過程；他以中央書記處第二號人物的身分，也時常過問黨和政府對外部門和事務的領導工作。彭真的對外活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協助中央處理對蘇聯的關係，多次參與中蘇高層會談，身處與蘇鬥爭和辯論的最前線，每以強硬的反「修正主義」者面貌示人。二、頻繁接見外賓，一方面介紹和辯護中共的治國政策和結果；另一方面宣傳和推銷中共反「蘇修」主張和對外政策。三、以政黨外交或議會外交為名出國訪問，力在增進邦誼和拉攏友黨，在國際上為中共爭取「反帝」、「反修」和「反殖民主義」的戰略夥伴。四、主持首都外交，既向其他共黨國家首都兜售執政經驗，也藉由與非邦交國城市的往來，拓展雙邊實質關係；同時著力發揮北京市作為中共對外窗口和講台的角色。彭真在對外關係的忠於職守和恪遵使命，可謂是毛澤東激進對外政策的一名主要幫手和得力推手。如此讓彭真聞名國際和享譽國內，中共中央在對外事務上也有對之進一步委以重任的趨勢；惟因彭真在「文革」初倒台而中斷告止。彭真在「改革開放」時期因其職權分工和年邁高齡，他在對外工作上的重要性和活躍度，已不能與「文革」以前的盛況相比。

**關鍵詞：**彭真、中蘇關係、議會外交、首都外交

\* \* \*

---

\* 作者特別感謝中國大陸學者李海文研究員對本文的惠予指導與支持。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作者並感謝兩位審查人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004-085）。

## 壹、前言

彭真在中共黨史上是一位相當重要的領導人物。他早在中共建政以前，即已成為中共最高領導團隊中的一名成員。中共建政後，彭真也長年位高權重，身兼多項要職：黨職方面，彭真從 1945 年起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到了 1956 年被選入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處，並被指定為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副手。政職方面，中共成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彭真就出任其常委會副委員長，實際主持全國人大的具體工作；另外，彭真也同時擔任中共首都北京市的負責人。

彭真在「文革」前長期獲得中央重用，在多項工作中扮演要角之際，他有否參與中共的對外關係和工作？在 1980 年代初期，由中共官方歷史機構負責撰寫的彭真簡歷中，明白指出：彭真在「文革」前「經常會見各國共產黨代表和各國國家領導人及各階層人士，並多次出國訪問，增進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1992, 61）。1997 年彭真去世後，中共新華社廣播介紹的彭真資料中也提到：「建國後十七年中，他作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成員」，在十個方面「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外事工作」就名列其中。更進一步說明彭真「代表黨和國家，會見過許多國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訪過許多國家，多次參加涉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大問題的會議和會談」（人民日報 1997）。然而，關於彭真在中共對外關係中的角色和作為問題，在中國大陸或西方相關研究中卻都沒有深入而系統的探究。

中共所撰的彭真官方傳記，雖然有專章對此問題進行描寫，但也僅圍繞在 1952 年彭真組織領導中共建國以後第一次舉辦的大型國際會議—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以及 1960 年他對中蘇兩黨關係的參與情形（《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739-762, 1034-1057；《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 2007, 230-238）。無法提供讀者一個較完整的彭真參與外交的全貌。西方專論或論及彭真的著作，都僅側重討論彭真在中共國內政治的角色和作為，而鮮有注意彭真的對外活動（Potter 2003; MacFarquhar 1974; MacFarquhar 1983; MacFarquhar 1997; Teiwes 1993; Huang 2000）。

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中共「文革」前的對外領導工作上，彭真與聞的情形如何？彭真參與的對外活動主要有哪些？政治效果又為何？彭真在對外工作的表現，對其自身產生什麼政治影響？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在「文革」前中共對外關係和工作中，彭真並非是一無足輕重的角色。彭真是毛澤東進行外交決策時會召集開會、諮詢意見的少數人士之一；彭真身任中央書記處第二號領導人，經常直接參與領導中共黨政對外部門的工作。彭真的主要對外活動有：在中蘇兩黨反目的過程中，不負上級所望盡責扮演「黑臉」向蘇方強勢交涉；盡心向外賓進行政策宣傳，也藉由出訪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持；盡力主持首都外交，積極配合中央對外部署並為之宣傳、造勢。彭真悍然反蘇和活躍能幹的外交形象，在國內、國外皆受到注意，更在中共高層間獲得好

評，令之在「文革」前夕的對外事務上有更大的聲音。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查、挖掘彭真個人歷史中未受注意的一個重要部分，並且對認識中共早期的對外決策和政治運作，以至中共外交史有所裨益。本文主要使用中共的官方檔案、回憶資料、年譜傳記、「文革」批判資料，以及訪談資料等。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有七個部分：首先說明彭真與聞中共對外事務的身分和職位，以及他如何參與中共對外決策和管理的過程。接下來逐一探討彭真在中共對外關係上的具體活動：協助處理中蘇雙邊關係；對外介紹和辯護中共政策；出國訪問以鞏固邦誼；施展首都外交以配合中央的外交攻勢。接著檢視彭真在「文革」前對外工作的表現，所受到的各方評價及其產生的政治影響，還有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批判。在結論的部分，簡單探討影響彭真「文革」前對外行為的主要因素，以及他在「改革開放」時期主要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身分參與對外活動的概貌。

## 貳、參與對外決策和領導工作

### 一、彭真參與對外最高決策的形成過程

毛澤東在中共的軍隊事務和對外工作上，堅持「大權獨攬」。長期分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即曾對從事對外工作的高級幹部表示：要謹記「授權有限」、「重大問題必須主席決策」，否則就有犯錯之虞（王力 2001, 343-344）。毛澤東在中共對外決策中的主導地位和對相關權力的集中壟斷，乃無庸置疑。然而，毛澤東在對外決策上的「大權獨攬」，指的是他主導議事、拍板定案，並非是他一人閉門造車。事實上，毛澤東在做出重大對外決策之前，會有一個討論醞釀、聽取意見的政治過程。他經常召集最高領導層，「議論天下大事」，而且要實質討論，不欲來者只是簡單附和、鸚鵡學舌而已（王力 2001, 344）。

毛澤東召集少數人討論重大國際問題和中共對外決策，主要包括由他親自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會議或常委會擴大會議，或者是舉行更機動的小型聚會，人數規模比常委會議還小。然而，無論毛澤東選擇哪一種開會形式和方式，彭真都經常在座與會。彭真雖然並非 1956 年中共「八大」的中央常委（成員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在 1958 年補選為常委），但是彭真深受毛為首的中共中央的信任，成為常委會議的固定座上賓。劉少奇就曾表示：彭真「經常參加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他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經常參加常委會議。」（劉少奇 2002）尤有甚者，彭真出席常委會議的頻率和次數，甚至較諸一些中央常委還高。例如：朱德年邁，對於毛慣在夜間開會，身體吃不消；陳雲、林彪因有病在身，時常請假。陳雲因經濟問題屢次與毛的看法有出入、差異，毛在 1962 年以後甚至不再通知陳雲參加常委會。相形之下，無論常委會議有無討論對外議題，彭真都持續而穩定地參與。另外，毛澤東有時找少數人就國際問題、對外關係進行座談或商議時，也經常可見彭真出

席。<sup>①</sup>

「文革」前長期作為中共領導人俄語翻譯的閻明復，熟悉中央高層的對外決策過程，即認為彭真乃屬「決策人」，地位僅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之後（2015, 125）。事實上，彭真對中共對外決策過程的活躍參與，實質是一個側面具體反映了他在中共政治佔有的重要地位。

## 二、彭真參與領導黨政對外部門的工作

中共對外關係主要分作兩個部分：一是黨對黨外交，屬於黨自身的對外交往工作，具體主管部門是黨所屬的中央對外工作聯絡部；另一是政府對政府外交，屬於政府系統的外交工作，具體主管部門是國務院所屬的外交部。<sup>②</sup>探討彭真如何參與領導涉外部門和相關工作，就必須依此分類作介紹和探討。

在黨對黨的外事關係方面，彭真可以參與領導和發揮，主要基於他作為中央書記處內僅次於鄧小平的政治地位。中共甚為重視與其他國家共黨的交往：如果對方已是執政黨，就是該國的核心領導力量；如果對方是在野黨，也是該國未來革命的主導力量。按組織關係和上下領導原則，中聯部直接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負責處理中共對外的黨際交往。亦即中央書記處是中聯部向中央請示或匯報工作的主要對象，中聯部必須聽命中央書記處並按之部署推行對外工作。

中央書記處的正副領導人是鄧小平和彭真。當中聯部向書記處尋求指示時，鄧小平在直接做出裁決時，出於對彭真的政治信任或是減輕工作的考量，通常也會將文件轉給彭真過目，要之知曉情況、幫忙把關或補充。鄧小平請假或請彭真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時，彭真更直接代表書記處對中聯部提請中央考慮的外事問題做出裁示。

另外，中共所轄的「群眾團體」（包括共青團、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婦聯）對外推行所謂的「人民外交」活動，其乃由中聯部統一管理。彭真以中央書記處領導人身分，或一度作為書記處內兼管工、青、婦工作的書記職權，也會對「群眾團體」的重要對外交往活動，直接或間接施行領導。

在政府對政府的外交關係方面，彭真得以與聞其領導工作，主要肇因於毛澤東安

註① 例如：1959 年 11 月 3 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彭真、王稼祥（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外工作聯絡部部長），在浙江杭州討論蘇聯最高領導人近期的政治報告，以及中共、印度交界最近發生的事態（徐則浩 2001, 474）。

註② 一、在「文革」前黨對黨的外事關係和政府的外交關係兩者之中，彭真參與較多、較活躍的是黨際關係。當時中共重視黨際往來甚於政府外交，作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彭真，在這方面也的確相形投入較深，例如：參與中蘇兩黨高層談判、出面處理中共和其他「兄弟黨」的往來和互動。二、在「以黨領政」之下，彭真得以憑藉其中央書記處的職位，過問周恩來麾下政府外交部門的領導工作。但是政府外交在實際推行時，因為彭真在全國人大任職，並無在政府國務院內擔任領導職務（前者是最高權力機關，後者是權力執行機關，人事不得重疊），代表出面、參與相對較少。彭真繁忙主持的是人大議會外交，作為黨際關係外，其對外活動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三、然而，如果從廣義的政府外交來看，彭真經常以北京市長身分主持和參與的一些首都外交、城市外交活動，也應可以視作「外交」的一環和範疇。

排中央書記處監管國務院各方面工作，以加強「以黨領政」。彭真在中央書記處第二號書記的地位，使之對政府外交有過問的機會和條件。1958年初，毛澤東批判國務院犯有自行其是的「分散主義」錯誤，更明白下令：中央書記處將國務院的工作「管起來」；中央書記處負責「具體部署」，國務院按之負責執行和細節決策（《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28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1998, 1396）。在此情況下，國務院的政府外交工作（由周恩來領導），也直接受到中央書記處（鄧小平、彭真）的指揮和節制。

周恩來領導政府外交工作時，出於對中央書記處新增職權的尊重，他對外交部呈報中央的工作意見做出處理和批示後，基本上都會提請鄧小平、彭真核閱；周恩來有時視事情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在給鄧小平、彭真核閱的同時，還會敦請劉少奇和（或）毛澤東審閱。在事涉政府外交工作的中共中央文件傳閱過程中，彭真可能事先已與周恩來經由電話或見面交談討論，並形成了共識。因為周恩來和彭真同是工作到午夜，幾乎同步收發和審閱中央傳閱文件。周、彭之間幾乎每日半夜經由電話長時「討論國內外重大事件，交換工作意見」（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 2012, 48）。因為彭真已知曉相關政府外交工作問題，所以他在核閱周恩來批轉來的中央外交文件時，有時尚未聽完秘書報告文件內容或是自己簡單翻閱文件後，即表示知情此事並在文件上圈可。<sup>③</sup>

另外，中共外交部在安排、設計國際活動時，著眼於彭真的重要地位和象徵意義，有時會規劃彭真參加一些外交活動。這種事涉彭真本人的文件，自會直接報送彭真，徵求其意見。彭真閱後會在其上做出批示，甚至以中央領導人的身分指導接待外賓或是參加外國使館宴會的問題。

透過上述的組織過程和管理模式，從 1950 年代中期延續到 1966 年「文革」爆發為止，彭真在中共黨政系統的對外工作上，一直發揮要而不顯的實際領導作用。

### 三、對外資訊的取得和重視

彭真在參與中共對外決策和領導工作時，其一般如何取得、吸收事關國際事務和黨際關係的資訊？首先、由於彭真是中共高級領導人，中央辦公廳每日會送給彭真個人辦公室各項重要的資料（固定時間外，有時也會臨時派送），其中就含有一些國際的資料。中共重要的涉外部門外交部、中聯部、新華社也都會向之呈送有關的資料；駐外使館亦會不時送來電報。面對如此龐大的涉外事務信息，工作甚為繁重的彭真，自無暇一一過目。彭真便要求其秘書負責先期過濾、挑選，擇要讓之讀閱或直接向之報告。秘書選材的主要標準是：優先擇取重大國際要聞和直接與彭真相關的資料（指明給彭真審閱，或是要之回覆或配合者）。彭真通常利用午休或夜晚閱聞這些涉外資訊（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 2012, 48）。

由於彭真參與中央領導、有時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他有「瞭解掌握國內、

註③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5年8月。

國際動態」的工作需要。彭真在 1959 年專門選找、設置一名秘書協助。此一秘書是當時北京市委所有工作人員中，唯一具有研究生學歷並熟諳英文者。他到任後的一項專屬工作就是負責每日翻閱、摘整《參考資料》的主要外電消息，另外也閱讀英文新聞資料，以知悉西方情勢。最後在晚間向彭真匯報，有時也陪之談論國際問題（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 2012, 48）。彭真在聽取秘書匯報時，最注意有關中蘇關係和其他所謂「兄弟黨」的情況和動向。彭真藉由這種安排，形成每日追蹤寰宇動向的習慣。這在中共高層間並不常見，甚至可以推論彭真是中共高幹群體中，最積極留心國際脈動的少數人之一。

彭真非常重視、在乎涉外重要消息和動態的掌握，嚴格要求他的身邊工作人員，務必助之「及時掌握第一手材料」。如果彭真在中央討論研議對外事務時，當毛澤東或其他重要領導人議論某事、自己卻沒有掌握到有關的情況，他在會後即責問秘書：「為什麼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有沒有電報材料？為什麼不送給我？」令後者特別緊張（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 2012, 48）。此乃因為彭真如果沒有事前知曉重要的國際情報，他在中央議事時就無法進入狀況、參與討論，從而失去了發言權。例如：1963 年中共第一艘自製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發生沉船事件。毛澤東、周恩來緊急就此進行討論，在旁的彭真因不曉此事的新聞而無法置喙，令之甚為尷尬、被動。散會後，彭真即追問秘書有無漏失相關訊息。<sup>④</sup>

中蘇關係是中共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在中蘇關係陷入緊張以後，有關蘇方的來信、反應和動作，中共中央辦公廳會連夜整理文件，並在早上 9 點以前送至各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室。但是彭真經常在凌晨 1、2 點，就親自打電話詢問相關的負責人員（閻明復 2015, 342）。這一方面反映彭真做事認真的態度，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藉此掌握政治先機。

## 參、協助中央處理對蘇關係

### 一、彭真歷經雙邊關係生變的過程（1956~1959）

在中共建政初期，彭真的工作重心主要置於領導和建設中共首都北京市，相形之下較少參與中央工作（包括中央一級的對外關係）。彭真在此階段與蘇聯方面的接觸，較多的是與其首都莫斯科，以及派遣至中國的蘇籍專家、顧問團（李越然 2001, 55）。彭真有時也會與蘇聯駐中共大使會面。例如：1953 年初，彭真向對方介紹中國知識分子的崇美、反蘇傾向，以及中共對此進行的思想改造工作（Woodrow Wilson Center 1953）。

1950 年代中期，隨著彭真對中央政治有更大的參與之後，他以中央領導人的身分

註④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5 年 8 月。

參與對蘇關係就愈益頻繁。1956 年、1957 年之交，彭真更率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大張旗鼓地訪問蘇聯和東歐五國。他此次訪蘇的時間點，正值中蘇友好關係開始出現微妙變化之際。

1956 年初，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其領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中國大陸譯為赫魯曉夫）對外推出「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對內嚴厲批判前領袖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錯誤和問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赫氏的相關政策頗不以為然，認為帝國主義邪惡本質不改，因此在對外交往不可一廂情願，在爭取和平的同時，不能放棄武力和訴諸暴力革命的準備；中共認為史達林功大於過，不能全盤否定。東歐特別是波蘭、匈牙利，出現思想混亂和民衆鬧事，就是因為蘇共冒然批史所致。彭真在 1956 年底至 1957 年初的蘇東行，無可避免地與蘇方人士觸及相關的問題。

1956 年底彭真先訪蘇聯，再訪問東歐；1957 年初他離開東歐回程行經蘇聯時，又短暫停留訪問。對於彭真的到訪，赫魯雪夫迅速予以接見，表示對彭真一行人的重視，也表露出對彭真個人的看重，認為彭真是中共的重要領導人物（李越然 2001, 118；閻明復 2015, 301）。<sup>⑤</sup>面對赫氏積極推銷其對外政策和批史觀點，彭真含蓄而有節制地陳述中共的不同立場。值得一提的是，彭真在行程中曾造訪史達林的故鄉，其政治意義不言可喻。因為中蘇關係尚屬友好平和，縱使雙方觀點存在歧異，但彼此皆有意克制、避免爭論（李越然 2001, 120-122, 134）。1957 年底，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 40 週年慶祝活動、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與 64 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中蘇關係有所回溫，但是此一政治好景持續不長。

在 1958、1959 年諸多問題的積累和影響下，中蘇之間的嫌隙逐漸深化並擴大成裂痕。例如：蘇聯對美國採取較和緩的姿態，中共認為這形同與虎謀皮；蘇聯則認為中共昧於時代發展、好鬥成性。蘇聯提出軍事合作構想如組建共同艦隊和設立長波電台，中共認為傷害其主權，蘇聯則覺得中共大驚小怪、小題大作。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爭論，蘇聯官方通訊社發表聲明表示中立，中共認為蘇聯喪失階級立場、胳膊向外彎。中共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先後發起整風運動和「大躍進」運動，標榜自我探索和意圖後來居上，讓蘇聯頗不是滋味；中共則不滿蘇方對此的非議和不予看好。

在上述事態的發展過程中，每當中蘇高層舉行會談時，彭真通常參加在座，也會插話質問蘇方人員，讓後者印象頗深。例如：1959 年 10 月 2 日，藉著赫魯雪夫率領高規格的代表團至北京參加中共十年國慶大典的機會，兩黨舉行正式會談。雙方針對多項問題直率地交換意見，並發生嚴重的爭執，彭真也加入戰局，言詞尖銳、態度激

註⑤ 蘇共中央方面早期對彭真的印象，恐怕不是太好。因為 1940 年代蘇聯常駐陝西延安的人員就認為：彭真是整風運動的積極擁護者和確鑿的反蘇分子（Vladimirov 1975, 375）。無獨有偶地，中共建政不久，蘇聯派駐中國專家團的領導人科瓦廖夫（Ivan Kovalev），在呈報給史達林的報告中，也指稱彭真有親美反蘇傾向（Woodrow Wilson Center 1949）。高崗倒台之後，劉少奇、周恩來向蘇聯大使通報高崗問題時，還特地為彭真澄清、洗刷，說科氏認為彭真親美反蘇，乃遭高崗讒言陷害（Woodrow Wilson Center 1954）。

動。蘇方的紀錄就特別註明彭真發言時所表現的氣急暴怒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59)。

## 二、彭真站在雙邊衝突公開化的第一線 (1960)

中蘇之間的裂痕持續擴大之下，在 1960 年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和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國際共黨會議，兩黨的衝突走向公開化。彭真是一名主要的當事人，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1960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世界工聯第十一次理事會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注意到蘇聯代表主導的會議報告草案，除了反映蘇聯的對外主張，更對中共當下推行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政策加上引號，被中方認為是蓄意為之、意在否定。彭真後來在 6 月 24 日對此表示：「這無疑是企圖煽動中國人民反對我們黨的總路線，正是因為這幾點——人民公社、大躍進和小型煉鋼——組成了我們總路線的根本基礎。」(閻明復 2015, 567) 是可忍，孰不可忍，包括彭真在內的中共「一線」領導人在會議首日的夜宴上，一起向會議代表表達中方的立場，蘇方人員當場抗議退席。由於中共中央移至上海開會，彭真奉命留守北京、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之後中共在世界工聯理事會的工作方針和發言內容，就統由彭真領導和監督 (《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c, 33-34)。在彭真的指揮下，中方在會上與蘇方針鋒相對，會下積極活動以爭取他者。最後，彭真同意王稼祥的建議，在略為讓步下，會議最後通過了一紙中共尚可接受的決議 (徐則浩 2001, 479；閻明復 2015, 554-555)。

中共利用世界工聯理事會的場合，首次正式對外說明兩黨的觀點歧異，並在國際組織論壇上率先公開彼此分歧，策動其他與會者挺中、反蘇。蘇共領導人對此極為惱火，認為中共犯忌在先 (如從事派別活動)，要其迷途知返 (沈志華主編 2007, 277-278)，便提出藉 6 月羅馬尼亞舉行黨代表大會、多國共黨聚首之機，交換意見。

中共中央預感屆時勢必有場惡仗，必須選將迎戰。中共原定的出席代表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但因其健康欠佳而作罷，最後毛澤東欽定彭真出馬。在步入 1960 年代後，中共的領導層逐漸高齡化，健康和體力漸次下滑。彭真相形之下有身強體壯、精力充沛的優勢，足堪負荷緊張的對外鬥爭和繁瑣的對外交往。更重要的是，彭真向為毛澤東所信任和重用，參與制定和負責執行中央方針和政策，熟稔黨的政治理論主張，對於中蘇歧異的來龍去脈也明瞭在心。彭真行前，毛對之面授開會方針：「堅持團結，堅持原則，摸清情況，後發制人，據理辯論，留有餘地」(李越然 2001, 198)。

果不其然，彭真前往羅馬尼亞的途中、短暫停留莫斯科時，即同蘇共領導人針對多項問題短兵交接、互不相讓；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彭真更遭遇赫魯雪夫策劃、領導的政治圍攻。中共的主要內外政策與舉措，近從世界工聯理事會爭論，遠溯中共在韓戰發起的角色問題，皆遭到貶責。彭真在承載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無論在中蘇兩黨會談、直接與赫魯雪夫對話，或是在出席大會活動時，皆不甘示弱，頑強回駁。蘇共

代表認為彭真有機會澄清質疑和解釋立場，卻說詞老調重複（沈志華主編 2007, 282）。但是彭真在會中表現的剛強不屈，<sup>⑥</sup>獲得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毛在會後不久評論：布加勒斯特會議是一場蘇共「圍剿」和中共「反圍剿」的鬥爭；面對「龐然大物」赫魯雪夫，「還是把他頂住了」（閻明復 2015, 588）。

中共從世界工聯理事會的主動進擊到布加勒斯特會議的拒不退讓（彭真皆站在鬥爭的最前沿），讓赫魯雪夫怒不可遏，在 1960 年 7 月突然宣布撤回蘇聯在中國大陸的專家，中蘇衝突從黨際關係進一步地蔓延至國家關係。

1960 年 9 月、10 月，鄧小平、彭真兩度率團前往莫斯科進行談判，為預定在年底舉行的國際共黨會議先行交換意見和準備前置作業。11 月，彭真作為劉少奇、鄧小平擔任正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的重要成員，參加 81 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劉少奇在 1966 年說：「彭真參加了一些國際反修鬥爭，我和鄧小平同志出去，都帶他一道去的，是想要在鬥爭中培養他」。（劉少奇 2002）彭真在 1960 年三度隨同劉少奇、鄧小平出國與蘇共交涉時，他確實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團員，而是深度參與代表團的對外鬥智談判和對內決策事宜。

在 9 月、10 月的兩次莫斯科之行，彭真配合鄧小平強勢迎戰蘇共的談判代表。例如：彭真大談自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受到蘇共「突然襲擊」之苦，控訴蘇方對待中共不是平等的兄弟黨，他還說自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境遇，猶如是「被圍攻的兒子」。蘇方人員則反過來指控彭真夥同鄧小平、周恩來在北京的世界工聯理事會「背著蘇共中央在進行反對我們黨的活動」。鄧小平與蘇方代表舌劍唇槍時，彭真一旁幫腔，兩人一搭一唱，好不默契。鄧小平發言被對方打斷時，彭真見狀質問：「你們還讓不讓我們的團長講下去！」（閻明復 2015, 620-632, 638-651）

在 11 月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共中央做出的安排是：由鄧小平、彭真擔任談判的第一線人員，劉少奇居於第二線。蘇聯在安排中共代表團的起居問題時，也將彭真和劉、鄧等同看待，讓之獨享一座別墅（吳冷西 1999, 370, 380）。中共代表團在訪蘇期間，臨時遭遇特殊情況、必須當場進行處置時，彭真與劉少奇、鄧小平共同討論、研商對策。例如：北越領導人胡志明（Ho Chi Minh）曾自作主張，半夜突然求見，意圖在中蘇共之間進行調解。劉、鄧、彭一起會商後，決定拒絕胡志明欲作調人之舉。中共代表團此次在莫斯科參加國際共黨會議期間，關於負責擬議大會重要文件的起草委員會工作，中共通常由彭真帶隊參加。中共在此會的最後階段，採取的策略是：以不怕破裂、不惜流會的強硬姿態，逼使蘇共退讓。這也是由彭真出面實行此計。彭真藉由細故向蘇方代表發難，要脅退出會議，迫使後者接受中共若干條件和要求，以換得會議最後在表面上平和收場（吳冷西 1999, 405-406, 411-413）。劉少奇

註⑥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Enver Hoxha），在 1979 年（此時中阿關係已大不如前）公開出版的日記中，兩次提到彭真在布加勒斯特會議的表現，認為其態度躊躇、膽怯（Hoxha 1979a, 333; Hoxha 1979b, 641）。值得注意的是，霍氏的相關記述（1967 年 1 月 7 日、1977 年 9 月 8 日），是在「文革」爆發以後，彭真已遭整肅下台、並被中共官方定性為篡黨奪權的反面人物。霍氏或有可能受此政治定論影響，而對彭真的外事表現予以負面評價。

在會後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為 1960 年中蘇之間不斷的衝突，暫時劃下句點。

毛澤東在 1961 年初曾評論：「我們黨有九十幾個中央委員，只有四個人出面和蘇方對罵，這就是彭真、康生、胡喬木，加一個鄧小平。」毛澤東並表示有此四人出面與蘇方對陣，可以讓毛和其他副主席「留一手」，亦即使中共中央保有升級迎戰的空間，或欲作緩和時的迴旋餘地（吳冷西 1999, 440-441）。

### 三、彭真參加兩黨交涉和論戰（1961~1965）

即便經過 1960 年的幾番激烈較量，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對於蘇共領導人還是持以「鬥而不破」的立場和抱以「治病救人」的心態，尚未簡單將之視作寇讎。1961 年 10 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中共中央決定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由此反映：1960 年先後在布加勒斯特、莫斯科與蘇共領導人交鋒的彭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再次倚重。蘇共「二十二大」舉行期間，赫魯雪夫高聲撻伐史達林，也大肆責罵阿爾巴尼亞，攻擊其冥頑不靈又特立獨行。這對向來維護史氏功績和同情阿國的中共而言，自難以接受；蘇共大批阿國，中共也懷疑其中不無針對中共指桑罵槐的用意。經請示中共中央，周恩來以回國參加重要會議為由，提前離蘇返國，改由彭真代理團長之職，繼續參加蘇共大會。

彭真已歷經多次與蘇共領導人針鋒相對的場面，經驗老道、無所畏懼。彭真自言其在會中以雙手平置桌面、拒絕鼓掌的身體語言，明確表達對蘇共相關作法的反對（吳冷西 1999, 479）。彭真在會議期間訪問列寧格勒，針對當地負責人聲明擁護蘇共中央的主張，忍不住還嘴：蘇共「二十二大」批阿、反史，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闡明復 2015, 722）。

彭真雖然站在與蘇共相爭的前線，但是並非殺得滿眼通紅、完全深陷其中，返國前囑咐中共駐蘇大使劉曉：「儘管兩黨爭論很激烈，但兩國關係還要保持友好」，要多做友好工作。彭真表示中蘇「改善關係的因素仍然存在著」，因為各自皆有此需要（劉曉 1998, 139）。彭真不好明說的是，此時中國大陸正受困於「大躍進」所造成的泥沼中，一時也實在無暇與蘇共死纏爛鬥。

中蘇關係之後又因如後問題而波瀾再起，包括：如何對待阿爾巴尼亞、新疆發生大量民衆逃往蘇聯事件、蘇聯認為 1962 年中印邊界衝突責任在中方，以及蘇共幕後操縱下東歐數國黨代表大會對中共群起而攻…等。從 1962 年底起，中蘇之間的政治爭論，更多地以文攻、筆仗的方式進行。中共為此成立一個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康生、吳冷西為正、副組長）。此一起草小組寫成的文稿，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再報送中央常委審定。鄧小平主持的審稿會議，彭真都會參加。有時在軍情緊急之下，為了方便領導並催促起草小組修改稿件，鄧小平和彭真還會住進起草小組的辦公地點釣魚台賓館（吳冷西 1999, 540-541, 567-568）。關於彭真對中共「反修」文章的與聞，也可證諸劉少奇在 1966 年所言：「我們中央寫了許多反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發表以前，我們看過，也都送彭真看。」（劉少

奇 2002)

中共中央的「反修」文稿上呈毛澤東爲首的中央常委以後，毛有時會召集若干中央領導人進行討論，彭真也經常在列。例如：1963 年 6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其中以 25 點的形式，條列中共迥異於蘇共的意識形態主張。毛澤東很重視這紙通稱爲「二十五條」的綱領式文件，在定稿公布之前，他對內召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討論，對外徵詢北韓、北越領導人的意見（王力 2001, 309）。

赫魯雪夫看到中蘇之間急遽升溫的批判態勢，建議兩黨舉行高級會談以停止公開論戰。1963 年 7 月 5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派出以鄧小平、彭真爲正副團長的代表團，前去莫斯科談判。彭真認爲蘇共邀約不懷好意：「把我們罵夠了，不外乎就是來這招兒，要求停止論戰，堵我們的嘴，不讓人民知道事實真相和我們的觀點。」事實上，鄧小平、彭真奉命赴蘇的談判索價極高—蘇共必須先承認錯誤，方可休戰，蘇共也難以接受（李越然 2001, 240）。不令人意外地，會談中雙邊針對國際共產主義的重大問題，各執己見、嚴拒對方觀點，猶如一場「聾子對話」（沈志華主編 2007, 336-337）。彭真和鄧小平回國時，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毛澤東親自接機，認可他倆堅定反對「蘇修」的立場。其後，中蘇之間又掀起一波意識形態爭辯的高潮。中共在此階段陸續發出所謂的「九評」，以及對蘇共中央的信件往來，彭真也有參與討論。

1964 年 10 月，赫魯雪夫因政變而下台。11 月，中共派出以周恩來、賀龍爲首的代表團赴蘇進行政治試探，不料發生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在敬酒時脫口建議賀龍推翻毛澤東的政治風波。毛澤東在北京召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彭真與他人無異，對此表現得甚爲憤慨（吳冷西 1999, 862）。彭真生氣最重要的原因，自應是出於維護毛澤東的忠心和政治表態，但可能也多少連結到他 1945 年擔任中共東北局書記時的不愉快過往，因爲當時馬利諾夫斯基率領蘇聯紅軍進佔東北，蘇軍曾揚言用坦克車逼使彭真撤出瀋陽。彭真對這起親身領教的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經驗，一直耿耿於懷（李海文、王燕玲 2002）。中共中央對敬酒事件追究不已，並據以判斷蘇共新的領導團隊執行的是「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主義」（毛澤東發送給周恩來的有關指令和判斷，彭真皆過目、同意）（吳冷西 1999, 864-865）。彭真後來在他國共黨面前，也傳播蘇共新領導與赫魯雪夫並無二致的觀點（閻明復 2015, 880）。

中蘇關係在赫魯雪夫下台後未見起色，到了 1965 年更繼續低盪。因爲中共強力反對蘇共在未與中共達致共識以前，即召開國際共黨會議。1965 年 2 月，毛澤東接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Aleksy Nikolayevich Kosygin）時，還特別指出彭真是反對最力者之一（吳冷西 1999, 916）。但蘇共對中共的意見置若罔聞，在 3 月仍執意舉行，讓中共甚是光火，兩黨關係幾近破裂。

## 肆、勤於接見外賓宣傳內外政策

### 一、彭真經常會見外賓和其所負任務

「文革」前彭真極為忙碌，集各項重要工作於一身。周恩來曾表示：在中國就屬他自己和彭真最忙（傅彥口述、陳麗紅整理 2013, 337）。彭真到底為何而忙？彭真曾自言：「中央的事情很多，又有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又要接待外賓。」（原北京市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 1967, 57）可見接見、會晤外賓的外事活動，在他整體工作中所佔有的比重和份量。

在中共中央「一線」的主要領導人之中，彭真會見外賓的頻率、次數，以及接待對象的種類，都是相當突出的。周恩來主管政府外交、也參與黨中央對外活動，在接見外賓的數量和密集度上，彭真自難與之相提並論。但是較諸劉少奇和鄧小平，彭真實也不惶多讓，甚至後來居上。在接見中共的重要外賓（包括國賓、黨賓）時，彭真通常會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同會見，或是陪同毛、劉單獨與之見面。當較為次要的外國黨的賓客來訪時，黨中央通常由鄧小平和彭真出面應對，以節省毛、劉的精力，不使之疲勞奔命；當黨賓的重要性又次一級時，大多就是由彭真出面接見、中聯部領導人陪同。按此原則，彭真會見黨賓的範圍和人數，恐就已比鄧小平還大、還多。另外，彭真兼任全國人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也要經常接見為數不少的外國國會訪問團、國會議員或其他各種類型的國外來人；彭真的北京市長身分，還讓他增加一批因首都外交遠道而來的外賓。

彭真代表中共黨國接見大量外國訪賓，僅只是履行外交禮儀上的送往迎來？實則不然，彭真在與外賓晤談時，乃負有重要的政策宣傳任務。外國使節和訪客對於中共對外政策、立場和動向，以及中國大陸情勢和走向，甚為關心和好奇。然而，並非所有的外賓都可以求見毛澤東、劉少奇或周恩來、鄧小平。與聞高層決策、年富力強的彭真，正可出面應答提問和周旋。事實上，彭真能言善道、反應敏捷、知識面廣，參與中共多方面的工作，在與外人應答的過程中，可以從容、嫺熟地提供許多具體、切題的細節，豐富中共外交、政治說帖的內容，讓外人比較容易了解和接受。

彭真稱職地作為中共政權對外的「化妝師」，可輔以時人時語證明。1954 年，彭真以北京市首長身分接見英國代辦，後者就對彭真在談論政治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機智風趣、冷嘲熱諷、信心滿滿印象深刻，並且認為與其說彭真是一名城市管理者，不如說他是一名政治領袖來得適切（Foreign Office 1955, 36）。1957 年，英國一份外交文件也指出：彭真與外賓談論問題時展現的精神奕奕、自信不拘和了然於胸，讓人感到已位居高層的彭真，未來還有更上一層樓的可能（Foreign Office 1957, 29）。

## 二、彭真談話宣傳的重點內容

彭真對來訪外賓進行政策宣講和辯護的內容，最經常提及的兩大主題是：中共國內政策和中蘇關係爭論。以下分別述之。

一、對外介紹中共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主張，並為其實行後果加以辯護。1956 年蘇共「二十大」批評史達林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包括彭真在內）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存在弊端，中共必須揚長避短，進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此後，中共逐漸推出有別蘇聯的政經政策，包括：1956 至 1957 年的「雙百」政策和整風運動，1958 至 1960 年的「大躍進」運動。針對中共這些國內政策的殊異評價，乃是中蘇共後來交惡的重要原因之一。彭真在接見外賓時，尤其是面對外國共黨人士，就格外為中共相關政策辯解。

1957 年的中共整風運動，原本是邀請黨外力量對中共執政提出指正意見，未幾卻變調成引誘捕抓黨內、外敢言之士的「反右派」鬥爭。蘇共認為中共錯估情勢、掉以輕心，才會出現先放後收的政策反覆。針對同一問題，彭真對「兄弟」國家如東德的使節振振有辭地表示：中國的資產階級一直對中共領導有所不服、尋機反撲；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準確掌握敵情，一開始就計劃捕打「老鼠」，「打開一個洞，讓它們鑽出來，然後把洞堵住圍打」。因此整個事態發展完全在中共的指掌之中（彭真 1958a, 3-4）。

彭真作為中共整風、「反右派」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對此一政治運動的發展過程和其間轉折（特別是毛和中共中央從初始的用心整風，到驚覺各方指責歷歷，方才惱怒翻臉、進而暗施「引蛇出洞」的情況），知之甚詳（鍾延麟 2014b, 247-292）。然而，他在國際友人面前對此卻作選擇性的回顧，只為掩飾中共當時一度陷入被動的尷尬局面，免得讓蘇共一再說嘴、訕笑。

為期三年的「大躍進」運動，彭真自始至終都是積極擁護者和主要執行人（Chung, 2015, 129-143）。外賓熱於詢問的問題，包括：大煉鋼鐵生產的土鋼的品質疑慮、漫天宣傳的農業生產奇蹟的真實性、農村和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情形，以及運動推行過程中出現的生產波動和物資緊張等。彭真都不厭其煩地詳予回覆，並多以瑕不掩瑜、前景可期加以維護（彭真 1958b, 2-7；1959a, 1-8；1959b, 1-3）。

1959 年中，鄧小平腿傷請假，彭真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不久因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書毛澤東，導致進入第二年的「大躍進」從原定的「糾偏」議程逆轉成「反右傾」。下廬山後，彭真對內協助毛浩浩蕩蕩地推行「反右傾」運動，大力批鬥、挖掘「大躍進」的質疑者（鍾延麟 2014a, 97-125）。對外，彭真負責代表中共中央，向各共黨國家大使介紹廬山會議情況並轉交會議的決議文件（徐則浩 2001, 468）。由於彭德懷在 1950 年代初期統帥中共軍隊在朝鮮半島逼和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部隊，聲名遠播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其何以一夕之間從戰爭英雄變成「反黨集團」頭目，這是彭真此段時間頗費唇舌向外賓說明的問題。彭真慣用的解釋和說詞是：出現「右傾機會主義

者」，是因為他們的革命意志不堅定，以及社會上既存的階級鬥爭在黨內高層政治中的反映（彭真 1959c, 1-2）。

在「大躍進」難以為繼、經濟困頓已全面浮現之時，彭真與外賓談話的焦點，轉為如何對外解釋中國經濟困局的成因。彭真的解釋無外乎中共官方標準的三點論：基層領導變質或遭壞人篡權，前所未見的大規模自然災害，以及蘇聯的落井下石。其中，彭真最常對外賓講的是自然災害問題，他一時有如氣象解說員，每每將中國大江南北的旱澇情況詳介一番（彭真 1961a, 2-3）。不過，參照後來的氣象研究，彭真對三年天災因素的強調，恐有誇大不實的成份在內（楊繼繩 2012, 649-659）。為了讓外界對中國國內局勢有信心，彭真在這時候對外賓絕口不提普遍存在的嚴重饑荒，並且強調「有組織的鬧事沒有」，也就是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固若磐石（彭真 1961a, 6）。

二、對外說明中蘇關係的問題癥結，尋求第三方的認同和支持。隨著中蘇之間爭論升級以至對峙局面的逐漸成形，彭真在與外賓談話時，更多地加入控訴蘇方言行悖理不義的內容，以努力凸顯中方作為受害者的處境。

彭真個性直率、敢言敢說，曾自言是一個「直筒子」。他膽敢與赫魯雪夫當面爭執，赫氏之下的蘇共領導人，更是不在話下。彭真在其他共黨或國家政治人物面前，火力全開地直陳蘇共的種種不是。阿爾巴尼亞在東歐直接面對蘇聯龐然的政治壓力，卻堅不屈就，中共視之為天涯知己。彭真在阿國人士面前，痛批蘇共從高崗問題起就抱有顛覆中共的不良意圖。彭真表示：「彭德懷反黨集團」乃是中共中央定案並業已正式通告各國共黨（彭真負責此項工作），但赫魯雪夫居然還稱彭德懷的意見正確，「這不是赫魯雪夫公開支持彭德懷反黨集團嗎」（彭真 1961b, 3-4）？彭真也對羅馬尼亞大使指控：1962 年新疆發生數以萬計的民衆跨界出走事件，乃是蘇聯背後煽動、慫恿所致（彭真 1963a, 11-13）。

關於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彭真在外賓面前大談蘇聯的居心不良和存心破壞，包括：蘇聯出口中國許多的機器，關鍵部分「夾住不給」（彭真 1963a, 9）；蘇聯在 1960 年突然撤走專家、撕毀合同、停止援助，是造成中國經濟困難、不得不進行調整的一項重要原因（彭真 1963b, 5）。彭真對外賓陳述的中蘇問題，有真有假、有實有虛。舉如：蘇聯單方面撤回專家和中斷協定，確有其事，但言之為中國經濟危機的成因，恐不符事實。因為經濟困難根本上源於「大躍進」政策本身的嚴重弊病；當時尚有的蘇聯專家和協定，多與國防工業有關，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不大（沈志華 2009, 314-315）。

值得一提的是，步入 1960 年代以後，開展、經營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成為中共對外的重點工作。中共一方面看好並希望擴大非洲「反殖民主義」的浪潮，期以削弱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勢力；另一方面，中共欲與蘇聯爭奪對「第三世界」革命運動的主導權，積極推銷中共的世界革命主張。在此背景下，彭真相當頻繁地接見來自前「黑暗大陸」的使者和客人。他在會見中著重闡述中共對非洲國家或問題的看法，也經常提到中國不惜勒緊褲帶、加速償還對蘇債務，藉以強調中共的外援政策不同於蘇聯的唯利是圖、條件苛刻。

彭真對於非洲外賓進行政策宣傳時，除了正襟危坐、侃侃而談，他也會採取一些較靈活、輕鬆的形式。1965 年 3 月 25 日，彭真設宴邀請非洲九國使節觀賞中共海軍編排、演出的話劇「赤道戰鼓」。易言之，彭真幾乎宴請了所有常駐北京的非洲各國代表，此一外交陣仗不可謂不大。彭真希望藉由美酒交杯、舞臺表演的軟性方式，向非洲嘉賓傳達中共對非洲開展「反帝、反殖鬥爭」的強烈支持。

## 伍、出國訪問爭取友邦支持

### 一、彭真出訪的性質和任務

彭真在「文革」前多次率團出國訪問，行跡遍及多國：北至蘇聯，西及東歐諸國（1956 年底也曾踏足南歐的義大利，參加該國共黨的代表大會），東達北韓，南到越南和印尼。其出訪的次數，在中共高級領導人中位排前列，僅在周恩來之後，而與劉少奇、鄧小平不相上下。

彭真訪問的形式可概分為兩類：一、政黨訪問，也就是彭真以黨的領導人身分，率領或參加中共代表團出訪。1960 年彭真率團前往羅馬尼亞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1960、1961、1963 年，彭真跟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赴蘇聯參加兩黨會談、蘇共大會和國際共黨會議，皆屬此類。相關的訪問情況，前面多有論及，此處不再贅述。另外，出於反「蘇修」互通聲息的需要，彭真也會單獨或連同其他中共領導人，作為中共黨的特使，臨時造訪北韓、北越，與其最高領袖短暫交換意見後即返國。

二、議會外交，也就是彭真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身分，率團出國進行訪問。彭真雖然不是全國人大委員長，但是劉少奇擔任委員長期間，即由彭真實際主持人大工作；朱德 1959 年接任委員長之職，但由於年事已高，在黨內又遭毛澤東批評（毛認為朱德在批評彭德懷問題上有所遲疑、表現不力；彭真亦曾面對朱德談話）（李海文、王燕玲 2002），因此實際上沒有發揮領導作用，而由彭真主控人大工作及其對外活動。

針對議會外交的目的和重要性，彭真在 1957 年曾作過說明：「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各國人民意志的集中的代表者的各國議會，如果加強彼此間的直接聯繫，溝通各國人民間的感情和了解，並且把維護世界和平事業擔當起來，那麼各國議會是可以做出自己的重大貢獻的。」（閻明復 2015, 305）彭真領銜帶團的議會外交出訪，主要包括：1956 年底至 1957 初訪問蘇聯和東歐五國，1962 年訪問北韓和北越，以及 1965 年訪問印尼。

必須強調的是，中共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雖強調「人民至上」，但其實更在乎的是「黨的領導」；相反地，其議會通常流於「橡皮圖章」之譏。彭真帶領全國人大代表團造訪他國，每每得以獲得接待國的最高領導人的接見，對方實際上是著眼於彭真在中共黨內的重要地位，而非彭真在人大議會的職位。彭真出國進行議會外交時，也一定

都會肩負中共中央委託的外交任務，這較諸議會之間的國際交往更為重要和關鍵。例如：1956 年、1957 年的蘇聯、東歐之行，中共中央在行前即交代彭真的訪問任務是：觀察相關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介紹中共的政策、建設和改造經驗，以及在「波匈事件」後增進東歐的穩定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閻明復 2015, 266）。彭真在訪問南斯拉夫期間，也臨時接到中共中央的指令，緊急向其最高領導人狄托（Josip Broz Tito）轉達中共欲與南國共黨共同發起召開共黨國際會議的提議（伍修權 1991, 310）。

1962 年，彭真帶領的全國人大代表團頻頻對外出擊：4 月 23 日至 5 月 3 日訪問北韓；9 月 30 日至 10 月 11 日訪問北越。彭真這兩次人大議會外交，分別獲得北韓、北越最高領導人金日成、胡志明的熱情接見。彭真訪問的最重要目的，當然遠高於所謂加強彼此議會聯繫、溝通兩國人民感情；實際上，黨中央交付彭真的核心任務是：觀察、拉攏這兩個分居東北亞、東南亞的鄰國友黨，使之在愈益激化的中蘇對立情勢中，選擇倒向中共。

根據匈牙利外交人員的觀察，彭真在訪問北韓期間盡其所能地頌揚金日成個人，以及其追求的自給自足經濟政策，讓金氏龍心大悅，更傾心於中共（Szalontai 2006, 185）；匈牙利臨時代辦也估判：北韓當時對社會主義陣營態度的略作調整，可能亦受到彭真訪問期間所作建議的影響（Woodrow Wilson Center 1962）。

從彭真自平壤發回中共中央的「朝方對我人大代表團的歡迎接待極為親切熱情。金日成委員長對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極為堅決」電報（《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c, 192），以及胡志明囑咐彭真帶回的「北京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詩句，皆顯示彭真的兩次議會外交，沒有空手而返，不負中央所望。事實上，彭真成功的國會外交，也為隔年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出訪北越、北韓，進行了重要的鋪路工作。

## 二、彭真 1965 年的印尼行

彭真在「文革」前的最後一次外交出訪活動，是 1965 年的印尼行。1965 年適逢印尼共產黨建黨 45 周年，由於印尼共產黨與中共關係良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頻頻唱和，對中共的立場加以聲援，中共中央決定派遣彭真率領中共黨的代表團前赴印尼參加相關活動，以示對之的祝賀和支持。以彭真在中共政治和外事上愈益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也想藉由委派彭真領隊，表達中共對印尼共的高度重視和期待。另外，彭真在國際共黨會議上或中印共兩黨互動中，經常與印尼共領袖如艾地（D. N. Aidit）、魯克曼（M. H. Lukman）有公事接觸，進而形成熟稔的個人關係，由之出面維繫兩黨關係，也顯得順理成章、得心應手。

針對中共指派彭真參加印尼共產黨黨慶的計畫，印尼外交部和其駐北京使館鑑於彭真在中共黨內蒸蒸日上的地位和影響，皆建議蘇卡諾（Sukarno）為首的印尼政府採取主動，藉彭真赴印尼參加共黨黨慶之機，正式邀之為國賓，同時對印尼進行友好訪問。對於印尼政府對彭真一行提出的訪問邀請，中共欣然接受。彭真的印尼行因而從原本的政黨外交，變成兼具黨際交往和政府交往的雙重性質和任務。

彭真的印尼行從 5 月 21 日開始至 6 月 5 日結束，為時半個月。彭真訪問印尼期間行程滿檔，會見了印尼朝野各派的重要人士。對於印尼政府和印尼共黨邀約和活動，皆無偏廢。政府外交方面，彭真讚揚蘇卡諾政府提出的「在政治上具有主權，在經濟上自力更生，在文化上具有特性」的執政方針，期許中印兩國在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上並肩前進。共黨外交方面，彭真致力推促印尼共黨在抵制蘇聯修正主義和反抗美國帝國主義問題上，繼續與中共保持高度一致。5 月 25 日，彭真在印尼社會科學學院對印尼共領導人和民衆發表的講話，最能彰顯中共此時的世界觀和國際觀，以及自我定位和政策追求。

彭真的演講要點是：一、「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受壓迫的亞洲、非洲、拉美和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但是「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對此視若無睹、罔顧事實；二、「美帝國主義是完全可以打敗的」，「赫修」卻散佈悲觀的論調和失敗的情緒；三、「現代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新的社會支柱」，因為「赫修」對革命力量起到瓦解、分裂、破壞、麻痺的作用，因而對「美帝」和「各國反動派」起到「別動隊」的策應作用。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要善於透過現象看清本質」，特別是能看清赫魯雪夫的繼承者仍是修正主義者；五、「在什麼基礎上才能真正團結對敵」？就是蘇共領導必須「拋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來」。六、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如中共和印尼共，必須「永遠要當革命的促進派」，奮勇前進。彭真在講話中頻頻援引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言論，以示其立論有據，也巧心引用艾地的講話，以表客主同心（彭真 1965, 1-30）。

彭真訪問印尼期間的表現，印尼共領導人甚感滿意。但是印尼政局隨後的突然生變，讓彭真個人甚至中共長年苦心經營的中印共兩黨關係，付之一炬，瞬間化為烏有。彭真在訪問印尼期間，參加、目睹印尼共產黨場面盛大的慶祝和遊行活動。或有感於該黨過度暴露實力，恐會招致敵對勢力的防備和襲擊，彭真先是提醒艾地要防止和應對突變，並建議安排兩組領導團隊，分處「地上」和「地下」；繼而向艾地強調：「在形勢大好的情況下，要看到逆轉的可能，要有兩手準備，吸取歷史上兩次被迫轉入地下的教訓」（閻明復 2015, 881-882）。然而，不知艾地有否採納彭真的建言，抑或是根本準備不及，僅約百日之後，印尼軍方涉入的「九卅事件」猛然爆發，印尼共黨猝不及防，甚至在短時之內即被連根拔起、滿門抄斬。不久前才被印尼共黨奉為觀禮貴賓的彭真，聞知此一變局，恐是百感交集、嘆息不已。

## 陸、積極推行首都外交

### 一、開展城市外交，輔助正式外交

彭真主持下的首都外交，<sup>⑦</sup>其交往對象約可分為兩類：一是與中共有正式邦交的國家（主要是共黨執政的國家）首都或重要城市；另一是尚未有正式外交關係國家的首都或都市。

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在與邦交國的城市發展關係時，因為雙方中央政府已建交，在兩國關係具有一定修好程度的前提下，其目的主要在側翼輔助或豐富雙邊正式外交的進展，而且因為政治受限較少，交往的形式和內容也甚為多樣。從人員訪問和接待、施政經驗的交流，到參觀市容和建設，以至於珍稀動物、植物的交換，都包括在內。現今中共仍慣常使用的「熊貓外交」，彭真成功應用於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雙城外交（北京市檔案局館、莫斯科市檔案管理總局編 2005, 44-45, 49-50, 53-54），如果不是開創首例，也是開風氣之先。

隨著彭真在中共上層政治和中央對外關係上愈加吃重的工作，關於北京市首都外交的一般往來和事務性工作，彭真多交予副市長萬里處理和應對。然而，彭真對於同東亞共黨國家進行首都外交，特別是當交流事項關乎對中共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經驗的詢問和介紹時，仍經常親自出馬。

對於北越和北韓而言，中共的社會主義實驗推行在它們之前，希冀經由彼此間的首都外交，直接借鏡中共相關的先行或先進經驗。事實上，彭真在這方面也確實很有政治資格和資本代表中共出面。因為中共中央推行重大的社會主義政策和運動時，彭真在北京市不但積極貫徹，更有心地總結經驗、積極向中央獻策，爭取成為全國仿效的表率 and 樣板（鍾延麟 2015, 139-140）。易言之，彭真一手操辦產生的「北京經驗」，既具有中國的代表性，而且經由彭真的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也有細節操作的參考價值。北越河內、北韓平壤各方面的考察和學習團，在中共「文革」前絡繹不絕地造訪北京，應與彭真這種熱情相待、傾囊相授的態度有關。

彭真對此一首都外交工作高度重視，恐也有現實的政治算計：彭真知曉河內、平壤在各自國內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地位，透過對它們的經驗傳授，可以不動聲色地將中共一些自我標榜的治國方針和經驗寧靜輸出，從而間接地履行中共中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欲與蘇聯爭作「革命導師」的戰略企圖。彭真的北京市為了避免讓人有「好為人師」之感，有時還會做出虛懷若谷、虛心學習的外交姿態，例如 1963 年

註⑦ 彭真在 1950 年代前半期主持的首都外交，其工作內容豐富，包括：與社會主義國家首都和非共產國家要城官員的各種往來、同駐北京的外國使節和蘇聯專家人員互動。因應彭真領導的首都外交活動日增和擴大的趨勢，北京市的外事部門在 1955 年還專程發文中央政府外交部，請示首都對外交往的應注意事項和有關準則問題。

北京市派出一個「赴朝鮮城市建設考察團」。

彭真領導北京市在與非邦交國的城市進行交往時，因為雙方中央政府沒有正式邦交，政治禁忌較多，發展也多受局限並進展緩慢。其目的主要是以較不敏感的政治身分嘗試進行外交接觸，在日積月累的耕耘下，為將來兩國正式外交的建立預作準備和鋪墊。彭真在這方面推行首都外交，著力最深的對象就是日本。

1970 年代初期以前，日本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其對中共並不予以承認，因此雙方沒有正式的官方往來。中共對日本採行的是「以民促官」、「以商促政」的政策，希冀與日本朝野多方廣泛交往，在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步驟下，逐漸造成水到渠成、不可扭轉的趨勢（曲星 2000, 327-328）。1955 年，日本六個城市提出希望與中國大陸交往的意願，彭真和王稼祥討論後，向中央提出以其北京市長名義出面接待這一日本地方組成的訪問團。彭真在北京市傳達、佈置此一外交任務時，不諱言「對日本我們要做工作，爭取它以孤立美帝」（《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b, 45-46, 59）。自此以後直到「文革」以前，彭真和北京市正式接待至少 7 次日本地方組成的各種代表團，並幾度在北京市舉行日本工商品展覽會，參觀人數每每超出預期，成為中日兩國在沒有正式外交下，雙方關係仍有實質發展的重要亮點。

1964 年中共中央決定由彭真率領黨的代表團，赴日本出席日本共產黨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這除了因為彭真經常代表中共中央參與中日共兩黨的政治協商和交往活動，他在推行首都外交時與日本各方人士的廣泛接觸、人脈累積，以及其所達成的政經績效，恐也是一個重要考量。彭真預定的日本行，最後因為日本佐藤榮作政府反對，而未能付諸實現。

## 二、安排外賓參訪，塑造正面形象

北京市是中共首都，乃是重要外賓訪問中國大陸必定駐足參訪之地。北京市的外賓接待工作非常繁重，任務負重遠遠超過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如何讓外賓對北京市、以至對中共政權留下良好的印象，乃是彭真在北京市竭思、竭力完成的外交任務。

彭真對北京市外賓接待工作的要求極高，強調令到行止、不打折扣。曾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兼管外事工作的柴澤民（後來出任中共首任駐美國大使），即對彭真的「事必躬親，一竿子插到底」、「高效率快節奏」印象深刻。北京市接待外賓的工作如果出現差錯或混亂，特別是惹得毛澤東不快的情況下，彭真在事後必定會追查涉及相關事故人員的責任（柴澤民 2013, 40-43）。

彭真在北京市成功接待外賓、讓人感到賓至如歸的例子甚多。1957 年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訪問中國大陸，中共中央甚為重視，希望對之加以款待，以博取其好感。伏氏停留北京期間，彭真賣力張羅接待，以配合中央的外交部署。彭真在北京市組織的群眾歡迎大會，其場面浩大、熱絡，讓俄賓受寵若驚、大為感動；與會群眾充滿熱情但又表現得井然有序，也教他們吃驚、佩服。伏氏對毛澤東、彭真表示：「我太感謝你們了，這個大會實在是出

色的，太好了。」（北京市檔案局館、莫斯科市檔案管理總局編 2005，15-16）彭真除了在北京厚待伏羅希洛夫為國賓，伏氏後來轉赴華南、華中訪問，彭真又專程前去陪同，令之極其愉快和滿意（李越然 2001，143）。赫魯雪夫 1959 年訪問中國大陸，沒有受到如此禮遇，冷暖自知，覺得中共厚此薄彼，因而牢騷不平（劉曉 1998，48）。

彭真領導的北京市負責具體籌辦中共每年重要節日的國家典禮活動。由於相關活動攸關黨國顏面，彭真親自掌握。彭真在推行首都外交、邀請外賓來訪時，有時也會有計劃地安排他們在北京共度節日、一同觀禮。由於彭真籌備國家重大慶典，不惜巨資和人力，因此場面盛大、流程順暢，常常讓與會的外籍人士（如前述的 1955 年日本六大城市訪問團），驚呼連連、叫好不己，進而心生中共治國有成、飽受民衆愛戴的印象。

為了協助中央宣揚重要國策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彭真就近安排外賓參訪北京市的建設和公社，有力地配合政府宣傳。1958 年，中共中央要求北京市在一年的時間內完成所謂的「十大建築」，以向中共國慶十週年獻禮並藉以具體展現「大躍進」的政策威力，彭真不負所望地如期完工。另外，彭真也利用「大躍進」之機，積極為北京市爭取大型工業投資項目，並迅速設廠投產（鍾延麟 2015，129，136）。彭真有心地引導外賓如北越的中央部長和地方首長，參觀北京市的「十大建築」和新興工業，讓其眼見為實，承認、信服中共相關發展政策的英明和優越。

中共在 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並高調聲稱此乃通往共產主義的必經橋梁，引起蘇聯的疑懼，連帶地也造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共黨對中共公社制度的觀望和狐疑。為了增進社會主義陣營對人民公社制度「優越性」的認識，彭真在北京市郊區特地設置多個友好人民公社，要之與其他共黨國家使館一一建立聯繫，並以兩國之名加以命名。然而，北京市各友好人民公社成立不久，中國大陸即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局和供給困難。即便如此，1960、1961 年北京市仍堅持安排這些友好人民公社主動邀請對口連繫的外國使館人員到社歡度春節，並贈送蔬菜食品。在饑饉壘罩的情況，北京市仍積極扮起對外宣傳「三面紅旗」的窗口角色，不免讓人有「打腫臉充胖子」之感。

### 三、主持、組織對外表態的群眾集會

在中共的對外關係上，彭真在北京市還負有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也就是針對中央對國際問題表態的需要，迅速組織大型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以展現中共對外立場具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和強烈的民氣支持。<sup>⑧</sup>

註⑧ 關於這方面的涉外活動，彭真與中國大陸其他主要城市領導人之間的重大區別在於：一、層級不同：彭真在北京市組織對外宣示的集會和遊行，除了代表北京市，更代表中央；彭真與會的身分和職稱，主要是中央領導人而非僅是省級、直轄市的領導人。二、主次不同：彭真在北京舉行的對外群眾性表態活動，在全國範圍內是核心主場，其他城市則是呼應、陪襯的次要角色。三、受關注度不同：彭真在首都辦理的相關活動，中央高度關心、參加人員陣容高規格外，常駐中國大陸的外國最高使節代表也會受邀參加；事後，國內、外媒體也最常對之報導。

在代表中央作對外宣示的首都群眾大會上，彭真通常扮演主角，名列大會主席團第一名。會議的主要流程一般是：宣布大會開始後，彭真代表中央講話；其後再由其他中共高官、各黨各派各界人士一一上台講話；接著大會通過決議；最後，在全場齊呼口號後，宣布大會結束。會後，發布新聞、刊登照片（主要登載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和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甚而在電視播放或製成電影。

仔細觀察這種外交表態性質的群眾大會的決策和籌辦過程，可注意其乃由中央策動、北京市具體承辦而成；彭真同時參與兩端的運作並負責銜接兩者。針對 1960 年 5 月中旬美國間諜飛機闖入蘇聯領空、引發兩國外交緊張的事件，毛澤東認為此事正好突顯蘇聯嘗試與美國進行和緩的得不償失，中共要立即表態支持蘇聯，以讓之辨別敵友，不再執迷不悟。5 月 19 日下午，毛澤東指示要在全國各地舉行支持蘇聯的群眾集會，並指定首都隔日就要帶頭舉辦。彭真即知即行，20 日在北京舉行一場百萬人出席的群眾大會，高聲表達擁護蘇聯、反對美國的立場（楊尚昆 2001, 503-504）。四個月後，彭真和鄧小平在莫斯科談判時，還專門提到此一群眾集會，並不滿蘇方對之的不予領情和態度冷淡（閻明復 2015, 639）。

## 柒、彭真涉外表現的政治影響與加分

彭真戮力貫徹中共中央對外的方針和政策，引起國際各方和中國大陸國內對之的關注和重視。

一、彭真在中共對外關係中重要而活躍的角色，海外頗為注意，視之為中共要員。蘇聯駐中共大使契爾沃年科（Stepan V. Chervonenko），到職履新未滿周年即注意到：毛澤東不太管黨國例行事務，而由劉少奇作主決定，周恩來在決策上則已被邊緣化；彭真、鄧小平站在劉少奇這一側（意指他倆支持並協助劉主持工作）。契氏認為劉少奇狡猾，對蘇聯不善；契氏表示在與彭真頻仍交涉的過程中，也見識到後者發脾氣、歪曲事實和虛偽的行徑（Woodrow Wilson Center 1960）。波蘭工人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自認與彭真相識熟悉，表示每當一起開會，就見彭真「唾沫四濺地申斥『修正主義』者」（Woodrow Wilson Center 1966）。

美國國務院的情報單位仔細觀察、分析彭真在布加勒斯特會議的言行和態度（沈志華、楊奎松主編 2009c, 398）。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在 1965 年不失準確地研判：彭真與劉少奇、鄧小平同是「強硬的國內政策的倡導者，有力地推動了北平與莫斯科的爭吵」（沈志華、楊奎松主編 2009a, 95）。1966 年初也評價彭真：「他在國際共產主義會議上是黨重要的發言人，因此在中蘇爭端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鑑於彭真身兼中共多項要職和在對外關係中的重要角色，中情局進而估判彭真在「毛之後，他將是黨領導權的主要競爭者」（沈志華、楊奎松主編 2009b, 538）。中情局也以彭真頻仍接見外賓，作為研判他在政治上安全無虞的重要根據之一（沈志華、楊奎松主編 2009a, 102）。

二、增加彭真在國內輿情的政治聲望。彭真在「文革」前代表中共對外進行的各

項活動，經過內部傳達和公開報導，讓人印象深刻。彭真參加 1960 年布加勒斯特會議的經歷，就成為普遍為人所知的重要事蹟。對於彭真經常接見外賓、率眾對外宣示和表態，以及代表黨國出訪，中共官方媒體報導連篇累牘，大大增加了彭真的見報率和曝光度。在「文革」前的一、兩年，彭真因外事活動見諸中共重要報刊的次數和頻率，與其他的中共「一線」領導人不分軒輊。1965 年彭真訪問印尼期間針對國際問題的演講，在他訪問結束之前，即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新華書局發行，《人民日報》還專門對此加以報導。這種少有前例的做法，也引人政治聯想和側目。

值得一提的是，彭真本人對於自身的對外工作和表現，引以自豪。彭真經常向身邊工作人員提起他與蘇共領導人正面衝撞的細節，言談之中對自己堅不退縮、對方無可奈何頗為得意（李海文、王燕玲 2002）。彭真對於自身的重要對外活動，希望不要「船過水無痕」，很注意這方面的官方宣傳。根據「文革」揭發資料，彭真對於中共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新華社如何報導自身的涉外活動，甚為關注；如有不滿意之處，就會囑咐秘書向相關媒體機構反映意見（原北京市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 1967, 53）。

三、彭真的對外活動對其自身最重要的政治影響，是使之獲得其他中共高層菁英的好評和信任。毛澤東曾在來自共產國家陣營的外賓面前，當面稱許鄧小平和彭真：「你們兩個是一小一大。」（李向前、王桂華 2002, 79）毛此言一方面是針對鄧、彭各自的矮高身材開玩笑，另一方面，也是意指鄧、彭兩人搭檔，在對內、對外工作皆配合得宜。事實上，彭真和鄧小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特別是中蘇關係上，經常一同出訪、聯手出擊。毛澤東就數次針對鄧、彭率領的訪蘇代表團的堅定立場和工作表現，加以表揚（吳冷西 1999, 364-365, 623-624）。經常在中央書記處或是國際場合與彭真並肩作戰的鄧小平，也給予彭真好評：「在布加勒斯特，彭真同志很不錯，經受住了。他有八十多公斤，我只有五十多公斤，而且腿不好。如果是我的話就要被打倒了！」（閻明復 2015, 633）1960 年代中期，鄧小平在政治上顯露疲態，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包含管理黨的外事工作和監管政府外交，他更多地委交給彭真應對。

中共高層對彭真對外表現的正面觀感和評價，讓彭真在對外事務上的地位進一步地上揚和增強。主管政府外交工作的周恩來，就表露出對彭真在相關領域扮演更大角色的支持。1966 年初，外交部召開第四次駐外使節會議，1 月 14 日，彭真以中央領導人的身分到會講話。彭真雖然主要代表中央介紹國內情勢和重大政策，他在講話中針對外交工作也提出「要樹立一個新的外交風格」的建議。對此，周恩來在同一會上就予以充分肯定。亦即周恩來不但沒有抗拒彭真對其外交工作的指手劃腳，反而加以響應，以示歡迎。3 月 12 日，即將赴河北調查的周恩來致信中央，提出在劉少奇、陳毅出訪期間，中央掌管的外交、國防工作交由彭真負責。這反映了周恩來在外交工作上對彭真的信任和放手。同月 24 日，周恩來和彭真一起與北越領導人會談。周在外賓面前還表示自己與彭真彼此在工作上的配合、照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1998, 1835；鍾延麟 2014c, 281-283）。

## 捌、「文革」前夕的發展和「文革」大批判

### 一、彭真在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上獨樹一幟

彭真在「文革」前夕中共對外事務上所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和自主，表現在 1966 年初春中共中央討論是否要派團出席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問題時，彭真的力排衆議、直陳己見。

1966 年 3 月 5 日，劉少奇奉毛澤東之命，召集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和主管外交部、中聯部的高幹，討論中共是否應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鑑於 1961 年中共參加蘇共「二十二大」的負面經驗，當時蘇共利用主場優勢，藉機批判阿爾巴尼亞，與阿國立場相近的中共代表團頗為被動、尷尬。團長周恩來先行返國以示不滿，改由彭真代理團長接續未完的會議，會議一致的意見是不去為好，此次討論的書面結果，經由彭真、劉少奇審閱後，發送給在湖北武昌的毛澤東參考，讓之做最後決定。

數日過後，眼見毛澤東仍沒有回覆，彭真提請劉少奇重新開會對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進行覆議。3 月 10 日，彭真在會上表示：「毛主席對重大問題決策時經常反覆考慮。上次請示已經四天，主席還沒有覆電。可以考慮從另一角度再提出一個方案，供主席參考。」彭真進而一改上次會議的態度，申明中共宜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各種理由。與會的多數人士，並不認同彭真的主張，仍傾向維持原有的不與會的意見。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對彭真的突然之舉也有所保留，表示上次開會已有定論並報告毛，雖可「反向思考」一番，但因人數不足（周恩來、鄧小平有事未出席），彭真力推的新主張不能作為常委會、政治局的集體意見。彭真雖碰了軟釘子，但鍥而不捨，會後再找劉少奇商談，也不顧中央「秀才」的反對意見，逕自起草文字，傳送給毛澤東（吳冷西 1999, 935-937）。

此事鮮明地反映：在中共中央「一線」領導人討論重大的對外問題時，彭真並非只是一個次要的跟隨者。因為彭真試想單方面地提出一個不同於「一線」集體商議後形成的共識方案，供毛澤東參考、定奪。只不過，彭真這次的「另類思考」，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毛先後藉著寫信和開會討論的方式，清楚表露反對中共派員出席蘇共「二十三大」的態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13, 565-567）。彭真頗為尷尬，急忙解釋自身本意只是欲讓毛參考另一種外交設想（吳冷西 1999, 938-939）。

彭真提出中共應思考派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可行性，無論是他出於耿耿忠心欲讓層峰思考更為全面，或是心想標新立異、甚至意圖政治窺測，其後果恐是適得其反。毛澤東對彭真的不悅、不滿，約在此時正逐漸形成、加劇，彭真此舉或讓毛對之的惡感又另添一筆（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91）。

## 二、「文革」中對彭真對外工作的評價

1966 年 4 月，彭真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之際，彭真曾自評：除了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因為自己不懂而認識滯後以外，他在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反修」在內，都是「不落後的」（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 1967, 97）。所謂「反修」，包括國內「反修」和國際「反修」。然而，在彭真確定政治倒台後，他在對外「反修」和涉外經營的功勞，隨即被貶得一無是處。這方面著墨最深的是劉少奇。

劉少奇貶損彭真在所謂的「國際反修鬥爭」中，無論是對外交涉或是審閱「反修」文章，都「提不出什麼意見」。針對彭真個人獨當一面、較為人知的國際活動，劉少奇也一一加以數落和批評。劉少奇指責彭真在 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表現得不夠堅強的，是比較勉強地去進行鬥爭的」。彭真在 1965 年對印尼的訪問，劉少奇說彭真「沒有履行黨中央討論的任務」，只重視參加印尼政府的活動，對當地共黨的活動不甚積極；至於彭真訪印期間的重要演說，劉語帶貶意地說它不是彭真所寫，亦即指他僅是照稿唸而已。連彭真主持的首都外交，劉少奇也不放過，說彭真在對外送禮上犯了僭越的錯誤，因為彭真代表北京市的對外贈禮，往往超過了黨主席毛澤東、國家主席劉自己，以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劉少奇 2002）。

在對外工作上曾特別提攜彭真的周恩來，1967 年對北越領導人指控彭真、鄧小平「不尊重兄弟黨間的平等關係」；在 1940 年代中期的延安整風和 1960 年代前半期反蘇鬥爭中與彭真密切配合的康生，1968 年更在外國人士面前指控彭真：「被蔣介石逮捕後自首變節。他不但是個叛徒，還繼續和蔣介石的特務保持聯繫。」（李丹慧編 2000, 281, 292）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期間中共高層曾對彭真的對外工作給予比較正面評價的人，竟是毛澤東。在毛的示意下，彭真在 1966 年「文革」伊始即失勢下台。然而，毛並未忘記彭真在「文革」前協助自身對抗蘇聯「修正主義」者的功勞，甚至曾將之作為試探重新起用彭真的風向球。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對周恩來、鄧小平談起 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明知故問鄧小平當年是誰代表與會，接繼表示「彭真對於整蘇修還是有功的」，並詢問彭真的近況（《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1267；《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 2007, 300；鍾延麟 2014c, 288-289）。毛最後雖然沒有在政治上「解放」彭真，但由此可見他對彭真的外交表現，乃牢記在心。

## 玖、結 論

從前述正文的描述和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文革」前中共的對外關係和工作中，彭真甚為活躍，從黨到政的對外交往、從中央到地方的涉外活動，都可見其繁忙蹤影。彭真以其資深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和中央書記處第二號書記的地位，既與聞最高外交決策的形成，也參與管理中央黨政對外負責部門的工作。彭真同時身兼全國人

大副委員長和首都北京市負責人職位，讓之在中共議會外交和城市外交上，也有長袖善舞的機會和舞台。

冷戰時期中共對外的核心議題——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彭真親歷雙方從交好到交惡的全部歷程。在雙邊高層會晤和國際共黨會議上，彭真經常狀若先鋒地擔負「出面和蘇方對罵」（毛澤東語）的角色。赫魯雪夫晚年回憶時，也未忘懷曾與自己多次交手、力爭的彭真，並且不吝稱讚其聰穎。赫氏寫回憶錄時，彭真已在「文革」中倒台，或因同遭罷黜、同病相憐，赫氏宣稱即便彭真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但他仍喜歡之（Khrushchev 2007, 488-489）。

彭真精力過人，「文革」前頻仍出面接見外國賓客和使節。彭真因參與中央機要、熟悉政策，再加上辯才無礙，他在會客時努力為中共施政、作為辯誣和美化，也道盡蘇聯內政外交上的弊病、陳疾，以彰顯中共與之「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正當性。彭真也多次率團出國訪問，足跡遍及社會主義多國，包括：蘇聯、北韓、北越、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也曾代表國家對一度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印尼進行正式國事訪問。彭真在風塵僕僕中，除了充當友好的信使，更負責傳遞中共的政治主張、爭取海外對之的認同，進而促成國際統一戰線的合作關係。此外，彭真還肩挑首都外交的工作，輔助、深化官方的正式外交，或彌補其之不足或不便；彭真也致力將首都作為宣傳「紅色中國」成就的對外窗口和樣板，並配合中央經常舉行群眾大會和遊行，向國際發聲和宣示。

影響彭真在中共對外關係中積極奮進的原因為何？首先是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和敬畏，以及對其主導制定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方針政策的信服。這在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是尋常易見的政治傾向。彭真和其他中共要人咸感毛澤東對內或對外都高瞻遠矚、洞燭機先。彭真對於經常受毛召喚、與之一同商議對外問題和政策，感到與有榮焉；彭真為了能言之有物、發言有據，以讓毛留有好感，他重視國際資訊的掌握和取得。俟中央對外方針和政策決定以後，彭真在其崗位上堅決執行，有過之而無不及。

彭真在對外關係上表現得與毛澤東亦步亦趨、深有同感，除了可能出於對毛的跟從、迎合或感激，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彭真對於「帝國主義者」亡華之心不死、「修正主義者」背棄先祖遺訓的置信不疑，也堅信反對殖民主義、奧援世界革命乃天經地義，使得他在推行相關對外政策時，不但未有遲疑，更有加乘、加碼的效應。彭真在對外思想立場上的堅定不移，有時會反過來限縮他在國內政策上的彈性，甚而加固其對特定問題的立場。「大躍進」期間彭真對人民公社本是興趣盎然、篤信不已；由於蘇聯方面對之的非議，1961年彭真憤而主張：「無論如何要把人民公社的旗子樹起來。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要這樣，我們一定要考慮這個影響。」（張素華 2006, 295）1962年中共「一線」領導人多考慮包產到戶是紓解國內農村困難的應急策略時，彭真仍堅定高擎人民公社的旗幟。不願在「蘇修」面前跌股，或是其一考量。

「文革」前彭真在中共對外關係多方面的汲汲經營和不倦投入，強力推動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理念和外交構想，並且在拓展中共的國際空

間、塑造國家對外的整體形象、分擔大量外交事務性工作上有所貢獻。然而，彭真對毛澤東激進的外交思想主張的信從力行、不遺餘力，促使中共不顧國力地對外走向偏鋒、極端，造成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國際社會的不安寧，也陷中共自身於孤立、邊緣。

睽違十三年後，彭真在 1979 年重返中共政壇，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受命主管中共的政法工作，另外接掌全國人大（1983 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致力法制建設。彭真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共對外關係的參與情形，相較於「文革」前，有若干重大的差異：一、彭真已不像「文革」之前那樣經常與聞最高外交決策和對外日常工作的領導。二、彭真雖接見一些重要的外國人士並且三度率團出訪，<sup>⑨</sup>但其頻率、次數、廣度，遠遠不可與昔日相比。三、彭真雖然可用其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身分，繼續在議會外交上做些文章，但已不再過問首都外交。四、彭真對外的談話主旨、工作方針，也與時俱進地從過去的反帝、反修、反殖、世界革命不離口，變成多講和平與發展、合作與學習。上述變化的出現，最主要是因為彭真的權力地位和格局不如既往，年已八旬的他，活動精力和政治企圖也大不如前。

感念於彭真長期以來在中共對外關係上的辛勤付出和奔波，1997 年彭真去世後，中共中央審定發布的悼詞中，特地贈予其「國務活動家」的稱號。

最後，本文對彭真對外角色和作為的研究，可以助於推斷中共體制下對外關係的若干核心特徵，例如：對外決策權力的壟斷集中（最高領導人為核心的寡頭決策形式和程序）和領導菁英層的高度共識，以及政策執行過程中既存在分工、又彼此配合的運作方式；對所謂「大國主義」的高度警惕和異常敵意（反映其貫從受害者角度的思考慣性，並常會流於過度敏感和反應）；濃郁的對外說理、論述傾向（有政治指導的作用，也有政治包裝的用途）；自命與較落後的國家為伍，為之仗義執言的同時，也兼謀自身利益。

\*

\*

\*

（收件：104 年 11 月 12 日，接受：105 年 5 月 12 日）

註⑨ 1982 年 6 月，彭真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1983 年 9 月，率領中共黨政代表團訪問北韓；1985 年 4 月，率領中共全國人大團訪問日本。

#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49~1966)

*Yen-Lin 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Peng Zhen's role in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received little research attention, and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Before erup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ng often attended central meetings, especially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s, presided by Mao Zedong, and participated in decision-making of major foreign policies. Besides, as the second-ranking leader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under Deng Xiaoping, Peng had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to lead and direct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ng's main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is policy fie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rst, Peng devotedly assisted the Mao-led Party center to deal with Sino-Soviet relations, always being the vanguard for criticizing and opposing so-called revisionists; second, Peng often received foreign guests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zealously propagandizing the natio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third, Peng visited many countr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socialist states or to find strategic partners in anti-imperialism, anti-revisionism and anti-colonialism; fourth, as the Party Secretary and mayor of the PRC's capital, Beijing Municipality, Peng enthusiastically pushed the capital towards capital diplomacy to support and supplement official governmental diplomacy.

Consequently, Peng was one of the most fervent activists in promoting and carrying out Mao's radical foreign policies. In contrast with his active and important role i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pre-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Peng no longer played prominent roles in foreign affairs, mainly due to his advanced age and relatively limited political power and status.

Keywords: Peng Zhen, Sino-Soviet Relations, Congress Diplomacy, Capital Diplomacy

## 參考文獻

- 《彭真傳》編寫組，2012a，《彭真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2012a. *Peng Zhen zhuan*. [Biography of Peng Zhen].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彭真傳》編寫組，2012b，《彭真年譜》，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2012b. *Peng Zhen nianpu*, Vol. 3. [Chronicle of Peng Zhen's Life, Vol. 3.].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彭真傳》編寫組，2012c，《彭真年譜》，第 4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2012c. *Peng Zhen nianpu*, Vol. 4. [Chronicle of Peng Zhen's Life, Vol. 4.].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2007，《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and Tian You-ru. 2007. *Peng Zhen zhuanlüe*. [Brief Biography of Peng Zhen].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人民日報，1997，〈彭真同志光輝戰鬥的一生〉，5 月 3 日，第 1 版。Renmin Ribao. 1997. "Peng Zhen tongzhi guanghui zhandou de yisheng" [The Glorious Militant Life of Comrade Peng Zhen]. May 3.
-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1992，《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Zhonggong shanxi shengwei dangshi yanjiushi ed. 1992. *Peng Zhen shengping dashi nianbiao*. [Chronology of the Major Events in the Life of Peng Zhen].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8，《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1998. *Zhou Enlai zhuan*, Vol. 2. [Biography of Zhou Enlai, Vol. 2].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13，《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 5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2013. *Mao Zedong nianpu (1949~1976)*, Vol. 5. [Chronicle of Mao Zedong's Life (1949~1976), Vol. 5].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王力，2001，《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Wang, Li. 2001. *Wang Li fansilu*, Vol. 1. [Wang Li's Reflections, Vol. 1]. Hong Kong: Beixing chubanshe.
- 北京市檔案局館、莫斯科市檔案管理總局編，2005，《北京與莫斯科的傳統友誼—檔案中的記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Beijingshi dangan juguan and mosikeshi dangan guanli zongju eds. 2005. *Beijing yu mosike de chuantong youyi: dangan zhong de jiyi*.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The Memory from the Archives].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 伍修權，1991，《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Wu, Xiu-quan. 1991. *Huiyi yu huainian*. [Reflections and Remembrance]. Beijing: 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chubanshe.

曲星，2000，《中國外交五十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Qu, Xing. 2000. *Zhongguo waijiao wushi nian*. [Fifty Years of Chinese Diplomacy].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吳冷西，1999，《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Wu, Leng-xi. 1999. *Shi nian lunzhan, 1956-1966, Zhong su guanxi huiyilu*. [Ten-Year War of Words, 1956~1966, a Memoir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李丹慧編，2000，《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Li, Dan-hui, ed. 2000. *Zhongguo yu yindu zhina zhanzheng*.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Wars].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李向前、王桂華，2002，〈電視文獻片：彭真〉，《百年潮》，11：75-80。Li, Xiang-qian, and Gui-hua Wang. 2002. "Dianshi wenxianpian: Peng Zhen" [Videorecording: Peng Zhen]. *Hundred Year Tide* 11: 75-80.

李海文、王燕玲，2002，〈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 1963 年後的關係〉，<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查閱時間：2015/10/30。Li, Hai-wen, and Yan-ling Wang. 2002. "Mishu Zhang Daoyi tan Peng Zhen yu Mao Zedong 1963 nian hou de guanxi" [Secretary Zhang Daoyi Talked about Peng Zhen-Mao Zedong Relationship after 1963]. (Accessed on October 30, 2015).

李越然，2001，《中蘇外交親歷記：李越然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Li, Yue-ran. 2001. *Zhong su waijiao qinliji: Li Yueran huiyilu*. [A Record of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the Sino-Soviet Diplomacy: Memoirs of Li Yueran]. Beijing: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沈志華，2009，《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新華出版社。Shen, Zhi-hua. 2009. *Sulian zhuanjia zai zhongguo, 1948-1960*. [Soviet Experts in China, 1948-1960].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2009a，《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貳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Shen, Zhi-hua, and Kui-song Yang, eds. 2009a. *Meiguo duihua qingbao jiemi dangan (1948~1976), Vol. 2*. [Declassified US Intelligence Archives on China (1948-1976), Vol. 2]. Shanghai: Dongfang chubun zhongxin.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2009b，《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參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Shen, Zhi-hua, and Kui-song Yang eds. 2009b. *Meiguo duihua qingbao jiemi dangan (1948~1976), Vol. 3*. [Declassified US Intelligence Archives on China (1948-1976), Vol. 3]. Shanghai: Dongfang chubun zhongxin.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2009c，《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伍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Shen, Zhi-hua, and Yang Kui-song eds. 2009c. *Meiguo duihua*

- qingbao jiemi dang'an (1948~1976), Vol. 5. [Declassified US Intelligence Archives on China (1948~1976), Vol. 5]. Shanghai: Dongfang chubanshe.
- 沈志華主編，2007，《中蘇關係史綱 (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Shen, Zhi-hua, ed. 2007. *Zhong su guanxi shigang, 1917~1991*. [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17~1991].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2012，〈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的歲月〉，《百年潮》，9：46-52。Yue, Xiang (recounted), Gen-qi Xiong and Yang Yang (recorded). 2012. "Zai Peng Zhen tongzhi shenbian gongzuo de suiyue" [The Years Working with Comrade Peng Zhen]. *Hundred Year Tide* 9: 46-52.
- 原北京市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 (1925~1966)》，北京：無出版項。Yuan Beijingshi shiwei jiguan Mao zedong sixiang hongqi bingtuan. 1967. *Da yexinjia, da yinmoujia Peng Zhen zuieshi (1925~1966)*. [Big Careerist and Conspirator: The Most Odious History of Peng Zhen (1925~1966)]. Beijing.
- 徐則浩，2001，《王稼祥年譜 (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Xu, Ze-hao. 2001. *Wang Jiexiang nianpu, 1906~1974*. [Chronicle of Wang Jiexiang's Life (1906~1974)].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柴澤民，2013，〈從容憶往〉，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並不遙遠的記憶》：3-6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Chai, Ze-min. 2013. "Congrong yiwang" [Remember Calmly]. In "Binghu yaoyuan de jiyi" [Memory not Faraway],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張素華，200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Zhang, Su-hua. 2006. "Bianju: qiqianren dahui shimo" [The Turning Point: The Seven Thousand Cadre Conference]. Beijing: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 傅彥口述、陳麗紅整理，2013，〈我的父親彭真〉，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研究與憶往—北京市紀念彭真誕辰 110 周年文集》：328-340，北京：北京出版社。Fu, Yan (recounted), Li-hong Chen (recorded). 2013. "Wo de fuqin Peng Zhen" [My Father Peng Zhen]. In "Yanjiu yu yiwang: Beijing shi jinian Peng Zhen danchen 110 zhounian wenji" [Studies and Memories: Beijing Municipality's Collected Writings Commemorating Peng Zhen's 110th Birth Anniversary],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 彭真，1958a，〈彭真同志接受民主德國駐華大使汪德爾到任拜會談話記錄〉（1958 年 5 月 2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9-00841-12 (1)。Peng, Zhen. 1958a. "Peng Zhen tongzhi jieshou minzhu deguo zhuhua dashi wangdeer daoren baihui tanhua jilu"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rade Peng Zhen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s Ambassador to China on 27 May 1958]. Document no. 109-00841-12 (1).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58b，〈彭真市長接見羅馬尼亞駐華大使魯登科談話記錄〉（1958 年 12 月 1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9-00866-01（1）。Peng, Zhen. 1958b. “Peng Zhen shizhang jiejian luomaniya zhuhua dashi ludengke tanhua jilu”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Beijing Mayor Peng Zhen and the Romanian Ambassador to China on 19 December 1958]. Document no. 109/00866/01（1）.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59a，〈彭真市長接見羅馬尼亞大使巴爾步·查哈勒斯庫談話記錄〉（1959 年 2 月 2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9-00911-10（1）。Peng, Zhen. 1959a. “Peng Zhen shizhang jiejian luomaniya dashi baerbu zhahaleisiku tanhua jilu”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Beijing Mayor Peng Zhen and the Romanian Ambassador to China on 25 February 1959]. Document no. 109-00911-10（1）.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59b，〈彭真同志和朱德委員長接見蒙古駐華大使沙拉布談話記錄〉（1959 年 7 月 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6-00133-04（1）。Peng, Zhen. 1959b. “Peng Zhen tongzhi he Zhu De weiyuanzhang jiejian menggu zhuhua dashi shalabu tanhua jilu”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rade Peng Zhen, Chairman Zhu De and the Mongolia’s Ambassador to China on 6 July 1959]. Document no. 106-00133-04（1）.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59c，〈北京市長彭真接受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巴利里辭行拜會談話紀要〉（1959 年 8 月 2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9-00906-06（1）。Peng, Zhen. 1959c. “Beijing shizhang Peng Zhen jieshou aerbaniya zhuhua dashi balili cixing baihui tanhua jiyao”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Beijing Mayor Peng Zhen and the Albanian Ambassador to China on 28 August 1959]. Document no. 109/00906/06（1）.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61a，〈彭真同志會見德國新任駐華大使黑根的談話〉（1961 年 6 月 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9-03762-07。Peng, Zhen. 1961a. “Peng Zhen tongzhi huijian deguo xinren zhuhua dashi heigen de tanhua”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rade Peng Zhen and the New German Ambassador to China on 9 June 1961]. Document no. 109-03762-07.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61b，〈彭真同志接見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馬利列談話記錄：關於阿蘇關係問題〉（1961 年 8 月 1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9-03747-04。Peng, Zhen. 1961b. “Peng Zhen tongzhi jiejian aerbaniya zhuhua dashi malilie tanhua jilu: guanyu asu guanxi wenti”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rade Peng Zhen

- and the Albanian Ambassador to China on the Albanian-Soviet Relations on 18 August 1961]. Document no. 109-03747-04.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彭真，1963a，〈彭真同志接見羅馬尼亞大使喬烏治談話記錄〉（1963年4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9-03897-04。Peng, Zhen. 1963a. "Peng Zhen tongzhi jiejian luomaniya dashi qiaowuzhi tanhua jilu"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rade Peng Zhen and the Romanian Ambassador on 21 April 1963]. Document no. 109-03897-04.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彭真，1963b，〈彭真同志接見第二批日本工業展覽會友好訪華團談話記錄〉（1963年10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5-01216-07。Peng, Zhen. 1963b. "Peng Zhen tongzhi jiejian dierpi riben gongye zhanlanhui youhao fanghuatuan tanhua jilu"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rade Peng Zhen and the Second Japanese Industrial Exhibition Delegation on their visit to China on 24 October 1963]. Document no. 105-01216-07.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彭真，1965，〈在印度尼西亞阿里亞哈姆社會科學學院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Peng, Zhen. 1965. *Zai yindunixiya aliyahamu shehuikexue xueyuan de jianghua*. [Speech at the Aliarch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Indonesia].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楊尚昆，2001，〈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Yang, Shang-kun. 2001. *Yang Shangkun riji*, Vol. 1. [Yang Shangkun's Diary, Vol. 1].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楊繼繩，2012，〈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Yang, Ji-sheng. 2012. *Mubei: Zhongguo liushi niandai dajihuang jishi*. [Tombstones: Recorded Facts on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in the 1960s].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 劉少奇，2002，〈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6月27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Liu, Shao-qi. 2002. "Liu Shaoqi zai zhonggong zhongyang zhaoji de minzhu renshi zuotanhui shang de jianghua" [Liu Shaoqi's Speech at the Democratic Personages Forum Presided by the CCP Center on 27 June 1966]. In "Zhongguo wenhua dageming wenku"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eds. Song Yong-Yi et al. Hong Kong: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劉曉，1998，〈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Liu, Xiao. 1998. *Chushi sulian banian*. [My Eight Years as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 閻明復，2015，《閻明復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Yan, Ming-fu. 2015. *Yan Mingfu huiyilu*. [Memoirs of Yan Mingfu].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鍾延麟，2014a，〈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為〉，《中國大陸研究》，57（1）：97-125。Chung, Yen-lin. 2014a. “Peng Zhen zai 1959 nian zhonggong ‘fanyouqing’ yundong zhong de jiese he zuowei” [Peng Zhen’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of 1959].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7（1）：97-125.
- 鍾延麟，2014b，〈彭真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2）：247-292。Chung, Yen-lin. 2014b. “Peng Zhen zai 1957 nian zhengfeng, ‘fanyoupai’ yundong zhong de jueise yu zuowei” [Peng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7].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6（2）：247-292.
- 鍾延麟，2014c，〈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2：261-302。Chung, Yen-lin. 2014c. “Zhou Enlai yu Peng Zhen guanxi zhi yanjiu（1928~197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Enlai and Peng Zhen（1928~1976）]. *The Journal of History, NCCU* 42: 261-302.
- 鍾延麟，2015，〈「文革」前彭真對中共首都的管理：政治方針、領導方式和幹部政策〉，《中國大陸研究》，58（3）：123-153。Chung, Yen-lin. 2015. “‘wenge’ qian Peng Zhen dui zhonggong shoudu de guanli: zhengzhi fangzhen, lingdao fangshi he ganbu zhengce” [Peng Zhen and the PRC’s Capital Governance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Principles, Leadership Style and Cadre Polic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8（3）：123-153.
- Chung, Yen-Lin. 2015.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74: 129-143.
- Foreign Office. 1955. “Notes on 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China（1955）,”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O371/114984.
- Foreign Office. 1957. “Notes on 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China（1957）,”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O371/127263.
- Hoxha, Enver. 1979a. *Reflections on China I: 1962~1972: Extracts from the Political Diary*. Tirana: The 8 Nëntori Publishing House.
- Hoxha, Enver. 1979b. *Reflections on China II: 1973~1977: Extracts from the Political Diary*. Tirana: The 8 Nëntori Publishing House.
- Huang, Jing. 2000.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hrushchev, Nikita. 2007.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ume 3: Statesman, 1953~1964*.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otter, Pitman B. 2003.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zalontai, Balázs. 2006.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iwes, Frederick C. 1993.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 Vladimirov, Peter. 1975.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49. "Report, Kovalev to Stalin Report ( December 24, 1949 )."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441> ( March 5, 2016 ).
-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5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oviet Ambassador in China, A.S. Paniushkin, with the Chair of the City People's Government in Beijing, Peng Zhen, 6 January 1953 ( February 2, 1953 )."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803> ( March 5, 2016 ).
-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54. "From the Journal of Ambassador Pavel Yudi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Liu Shaoqi and Zhou Enlai ( March 9, 1954 )."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1377> ( March 5, 2016 ).
-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59. "Discussion between N.S. Khrushchev and Mao Zedong ( October 2, 1959 )."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088> ( October 31, 2015 ).
-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6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Albanian Ambassador to the PRC Mihal Prifti and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PRC Stepan V. Chervonenko ( June 27, 1960 )."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863> ( March 5, 2016 ).
-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62. "Report, Embassy of Hungary in North Kore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 August, 1962 )."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774> ( March 5, 2016 ).
-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66. "The Polish-Soviet Talks in Moscow ( October 10-15, 1966 )."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556> ( March 5, 2016 ).

